


政治哲学史教程

——一种解读人类政治文明传统的新视角

陈开先◎编著

 科学出版社
www.sciencep.com

政治哲学史教程

——一种解读人类政治文明传统的新视角

陈开先 编著

科学出版社

北京

内 容 简 介

本书围绕着西方政治哲学的正义问题之主题来展开论述,着重从西方政治哲学正义传统的形成、颠覆和重建的思想历程和学术过程来讲述并诠释西方政治文明的思想遗产,并指出这一文明传统与中国古代的政治文明传统存在着深切的契合关系。希望通过这样的一种新视角的研究与解读告诉读者:正义是西方政治文明的核心主题,只有符合正义主题的自由与民主,才可能符合人类生存的至善目的。而古代中国的政治文明传统并不虚无,她可以在符合人类至善目的的意义上与西方政治文明的传统相契合,并具有其自身之优美特征。

本书适合高等院校本科各专业学生使用,同时也可作为对哲学、政治学感兴趣人士的参考读物。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政治哲学史教程:一种解读人类政治文明传统的新视角/陈开先编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0.4

ISBN 978-7-03-027132-7

I. ①政… II. ①陈… III. ①政治哲学—哲学史—西方国家—高等学校—教材 IV. ①B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0)第057173号

责任编辑:王剑虹 王昌凤 / 责任校对:朱光光

责任印制:张克忠 / 封面设计:鑫联必升

科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16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铭浩彩色印装有限公司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10年4月第 一 版 开本:B5(720×1000)

2010年4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17 1/2

印数:1—3 000 字数:350 000

定价:2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

目 录

导论 政治、政治学与政治哲学	(1)
第一章 正义传统的形成——欧洲古代政治哲学	(11)
第一节 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的摇篮	(11)
第二节 关注正义——柏拉图政治哲学	(19)
第三节 解析正义——亚里士多德政治哲学	(29)
第四节 再论正义——西塞罗政治哲学	(38)
第五节 神与正义——基督文明精神	(47)
第六节 基督与正义——奥古斯丁与阿奎那政治哲学	(55)
第二章 与正义神契——中国古代政治哲学	(65)
第一节 和谐秩序——华夏文明的源与流	(65)
第二节 仁爱德治——孔子政治哲学	(73)
第三节 守弱抱朴——老子政治哲学	(83)
第四节 王道仁政——孟子政治哲学	(91)
第五节 群分礼治——荀子政治哲学	(100)
第六节 礼治文明——作为政治哲学的经学	(109)
第三章 正义主题变奏——欧洲近代政治哲学 (上)	(119)
第一节 颠覆正义——马基雅维里政治哲学	(119)
第二节 重拾正义——博丹与格劳修斯政治哲学	(127)
第三节 解构正义——霍布斯政治哲学	(136)
第四节 正义传统重建——洛克政治哲学	(144)
第五节 传统与正义——休谟与柏克政治哲学	(152)
第六节 功利与正义——边沁与密尔政治哲学	(161)
第四章 民主自由与正义——欧洲近代政治哲学 (下)	(172)
第一节 为民主正名——孟德斯鸠政治哲学	(172)
第二节 为民主呐喊——卢梭政治哲学	(180)

第三节	为民主奠基——康德政治哲学	(189)
第四节	为民主加冕——托克维尔政治哲学	(198)
第五节	民族与自由——黑格尔政治哲学	(206)
第六节	自由与拯救——马克思政治哲学	(214)
第五章	现代秩序的解构与建构——欧洲现代政治哲学	(223)
第一节	保卫自由——波普政治哲学	(223)
第二节	自由宪政——哈耶克政治哲学	(232)
第三节	解构权力——福柯政治哲学	(241)
第四节	呼唤正义——罗尔斯政治哲学	(250)
第五节	自由为本——诺齐克政治哲学	(258)
第六节	商谈民主——哈贝马斯政治哲学	(267)
后记		(276)

导论

政治、政治学与政治哲学

一、生活游戏与政治

奥古斯丁在《忏悔录》中曾说：“什么是时间？别人不问我的时候我倒觉得清楚明白；但等别人问我，我想去说明的时候，便又觉得茫然不解了。”其实，我们对“政治”也同样有这种感觉。我们可以搜集到的关于“政治”的表述有以下几种。

(1) 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认为：“一切阶级斗争都是政治斗争”，“政治是经济的最集中的表现”，“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活动的形式、任务和内容”，“政治是一种科学，是一种艺术”。

(2) 西方政治学家为政治下的定义有：①政治是国家的活动，是治理国家，是夺取或保存权力的行为。②政治是权力斗争，是人际关系中的权力现象。③政治是人们在安排公共事务中表达个人意志和利益的一种活动，政治的目标是制定政策，也就是处理公共事务。④政治是制定和执行政策的过程。⑤政治是一种社会的利益关系，是对社会价值的权威性分配。

(3) 当代中国政治学界对“政治”概念的主要看法有：①政治是各阶级为维护和发展本阶级利益而处理本阶级内部以及与其他阶级、民族、国家的关系所采取的直接的策略、手段和组织形式。②政治是一定阶级或集团为实现其经济要求而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的活动，以及实行的对内对外全部政策和策略。③政治是主要由政府推行的、涉及各个生活领域的、在各种社会活动中占主要地位的活动。④政治是阶级社会的产物，是阶级社会的上层建筑，集中表现为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之间的权力斗争、统治阶级内部的权力分配和使用等。

从这些表述中我们几乎找不到它们的共同性，同时，这些表述与我们生活中的直接经验也很难产生共鸣。于是我们不禁要问：能不能从生活的经验中抽象出那种适合于普遍演绎的“政治”概念来呢？下面我们不妨尝试着来为“政治”寻求这样一个定义。

首先让我们来研究一下“生活游戏”的概念。这个概念来自著名哲学家维特根斯坦，他在后期研究语言现象的时候发现，语言与人们生活中的游戏有许多相似之处，于是把那种具有遵守规则特征的语言现象称为“语言游戏”。维特根斯坦使用的“游戏”德文原词 sprachspiel，英文 game，均不是简单娱乐的意思，它实际上涉及人们的日常行为或生活内容的几乎所有方面。德国哲学，甚至整个西方哲学对游戏概念的理解，都延续了这样一种意思，即都把人类的所有活动看做一种或一类游戏。这样被扩大了外延的“游戏”概念，可以泛指人类的所有活动，或者说从哲学视角看，人类的许多现象都可看做是一种游戏。维特根斯坦把语言现象看做游戏，于是称为语言游戏；我们同样可以把人类的政治和经济现象也看做游戏，即公共生活的游戏，简称生活游戏；还可以把科学和艺术的现象看做游戏，即文化游戏；把体育、博弈等以娱乐为内容的游戏称为娱乐游戏等。

任何一种游戏必须具备三个基本要素：

(1) 游戏内容。比如博弈的游戏，棋或牌便是它的核心内容；竞技体育，比赛的项目便是它的游戏内容；作为游戏来看的政治，公共权力资源的分配便是它的核心内容；作为游戏来看的经济，商品（经济物品）的交换是它的核心内容；科学则以知识的创造为核心内容，艺术则以审美品的创造为核心内容。

(2) 游戏规则。游戏必须以一套规则为基础，无规则就没有办法开始游戏，从某种意义上讲，规则是游戏的核心特征。关于规则，维特根斯坦作了开创性的研究，他告诉我们规则是人们行为的路标，人们往往盲目地沿着规则指示的方向前进，而不去思考路标的对错；不存在私人规则等。

(3) 游戏目的。任何游戏都必然存在目的，比如，竞技体育是为了娱乐，政治的权力运作是为了实现人们社会生活的幸福（至善），经济活动为了优化经济资源的配置，科学为了追求真理，艺术为了给人提供审美享受，等等。

按照前面的界定，政治现象作为一种生活游戏，它的中心内容是公共权力资源的分配。首先必须要指出的是，所谓权力是指能够让别人服从自己的能力，这种能力通常又称为权威。权力的大小通常是以服从人数的多少来界定的，权力一般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个人权力，主要是凭借个人的实力来获得或建立其权威；②社会组织权力，主要是凭借社会组织的固有属性来获取或建立其权威，譬如家长凭借的是其在家庭中的地位所拥有的权威，企业董事长凭借的是他作为出资人所拥有的权威等；③公共权力，主要是凭借国家机器（军队、警察、法庭等）的强力来赋予其权威，同时作为一种社会资源只有它才具有一种公共性，即从权力归属来讲它属于全体人民所共同拥有，从权力行使的目的来看，它应该以服务于公众为目的，也只有这种权力才能够成为政治游戏的核心内容，并被称为政治权力。

有了以上的基本知识，我们就可以按照亚里士多德“种加属差”的办法，来为“政治”概念寻找一个逻辑学意义上的定义，即通常所说的“本质定义”。政治概念所属的“种”就是我们前面所研究的游戏；而政治概念的“属差”就是“以公共权力为核心内容”，于是我们便可以说：政治是以公共权力为核心内容的游戏。

守规则性是作为一种权力游戏的政治最重要的特征之一，政治权力的运作必须以规则来进行规范，这些规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制度。没有规则政治权力将无法运作，社会的公共政治生活就无法形成；简单的游戏规则只能形成关于权力运作的简单规范，这样所成就的只能是一种简单的、淳朴的政治生活，这种生活只有在人类文明生活的早期阶段才会成为可能；人类文明演进的最重要方面是政治文明的演进，主要表现在规范权力游戏的规则体系的进步上，这种进步并不意味着规则内容的繁复，而是意味着规则更能够体现人道，体现人们对政治现象的反思所取得的认识进步，即体现出一种由思想进步和物质进步而推进的政治的文明进步，我们通常把这种体现在政治制度进步中的文明称为政治文明。

二、政治学与政治哲学

首先提出政治哲学概念并把政治哲学作为一门学科来加以研究的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的著名政治学和哲学教授列奥·施特劳斯，他针对当时在美国十分流行的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而与他的学生克罗波西合编了一本系统阐述自己政治哲学立场的著作，取名《政治哲学史》。萨拜因的《政治学说史》是一部“从社会相对论的观点出发而撰写的全面论述西方政治理论的史书”，他的社会相对论认为：政治理论很难说是正确的，因为其中包含有价值判断（这种价值判断歪曲了它们的事实判断），而且它们不可能摆脱它们同其所处时代中的问题、价值、习惯甚至偏见的关系。或者说，政治理论都是依赖于历史情况的，脱离了具体的历史情况便失去了意义。由于强调政治理论对历史情况的依赖，萨拜因的著作特别关注政治理论产生的时代背景，因而他的著作包含了广泛的历史情况和时代背景的介绍。

施特劳斯则认为，正是这种相对主义和历史主义导致西方世界放弃了对人类目标的理性思考，放弃了关于好坏、善恶、正义与非正义标准的真正知识的探寻，从而导致了西方世界的道德虚无主义盛行和思想境界的堕落，造成人们随波逐流、盲目信从以及在政治领域庸俗市侩作风的大行其道，进而使得整个西方世界丧失了它原有的宗旨、目标和信念，并在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上陷入全面的危机。为了摆脱这种危机，人类就不能不回溯自己的历史，并从历代思想家关于政治的哲学思考中汲取智慧，于是其《政治哲学史》更强调面对经典，更强调研究

和阐述政治哲学家对政治哲学基本问题的思考、理解和阐释，政治哲学的基本论题有时不完全是政治的，而可能会上升到对人生的意义和人类社会生活的意义等较为深层次哲学问题的追问。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哲学史是关于人、国家、社会、历史、政治及社会制度的形而上学史，不过，这里是在“元哲学”意义上来使用形而上学的。

施特劳斯为政治哲学所下的定义是：政治哲学是哲学的一个分支，它以寻根求源的方式广泛而系统地来探讨人类政治生活的问题。这个定义首先为我们规定了政治哲学是一种哲学，而哲学就是要让那些“摆在人们眼前”似乎不理解的东西变得能够让人们理解，因而哲学是必须面对问题的，正如形而上学所面对的是诸如“存在”之类的最根本问题一样，政治哲学所要面对的是人们政治生活中所遇到的根本问题，并且政治哲学所要采取的研究方法是寻根求源的、广泛而系统的方法。但这个定义的不足之处在于，从定义中我们看不出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政治学）的根本区别，因为政治理论所要研究的也是人们政治生活中的基本问题，寻求政治运行规律的理论所使用的方法也很难说不是寻根求源和广泛系统，因此这个定义是无法令人满意的，我们有必要为政治哲学寻找更加完善的定义。

回到我们所研究的“政治”定义，既然我们已经知道政治是以公共权力为核心内容的游戏，而这种游戏又是以一套关于权力运作的规则来加以规范的，那么，对于权力运作规律的研究，以及对政治游戏规则的研究便是政治学或称为政治科学所研究的对象，关于这些对象的研究所形成的理论，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政治理论，这些理论往往以“××主义”的方式来加以命名，诸如自由主义、平等主义、民主主义、共和主义、极权主义，这些主义不过是一些关于政治游戏如何进行、游戏规则如何制定的主张，这些东西并不是政治哲学，否则政治哲学与政治理论或政治学就没有什么根本意义的区别。施特劳斯也已经意识到按他自己的定义很难将政治哲学与一般政治理论区别开来，于是他又解释说，对于政治领域中的事物，我们不可能不持赞成或反对、选择或排斥、赞美或谴责的态度，所有这些态度都涉及好与坏、善与恶、正义与不正义的判断，而这样判断是以一定的判断标准为前提的，政治哲学的努力就是要探讨这些标准，以期获得关于这些标准的真正知识。

按照施特劳斯的解释，政治哲学不是要以政治游戏的规则体系为对象，而是要以这种规则体系的合理性为对象，不是要研究权力在这种规则体系中如何运作，而是要研究这种权力的运作是否具有合理性。因此，政治哲学是对规范权力游戏的规则体系的合法性所进行的研究和追问。普通人一般不会对权力游戏的规则产生怀疑和追问，研究政治学的人也不会对权力游戏规则合理性产生自觉的追问，只有政治哲学才会以哲学家的敏锐智慧穿透人们社会政治生活的迷障，而

对权力游戏规则的合理性——人们日常生活形式的合理性进行反思和追问，并且也只有在这一层次和深度上的追问才可以称得上是哲学的反思和追问。进一步需要指出的是：哲学家依据什么来对权力游戏规则的合理性进行评价？我们前面在讨论游戏理论时曾指出，游戏具有内容、规则、目的三要素，其中目的要素就是用来评价游戏规则是否具有合理性的基本依据，譬如足球比赛中将胜一场记2分改为记3分，所依据的就是游戏目的的改变，因为早先的足球运动主要目的是游戏参与者的娱乐与健身，但当足球演变成一种体育产业之后，观赏性便成为游戏的主要目的之一，改胜一场记3分可以鼓励运动过程加强进攻以提高观赏性。政治哲学家也是通过辨识权力游戏的目的来建立评价权力游戏规则合理性的标准，并通过将规则与标准相对照的方式来评价游戏规则好与坏、善与恶，进而评价政治行为的正义与非正义的。

三、西方政治哲学及其历史

施特劳斯大约在1946年前后就已经提出了“政治哲学”概念，并使用政治哲学的方法来研究古希腊哲学，尤其是重点诠释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哲学。1953年写成的《自然正当与历史》是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经典著作，在这部著作中，他使用政治哲学的方法系统研究了西方各个历史时期的政治思想，从而构建了一个比较完整的“政治哲学史”的理论框架。在施特劳斯看来，西方政治哲学可以马基雅维里划界，分为古典政治哲学和现代政治哲学两个截然不同的历史时期，显著不同的是：古典政治哲学使政治服从于道德德性，更服从于作为人的目的或人的灵魂之善的理论德性；而现代政治哲学则将德性服从于政治，把德性看做一种政治上有用的工具，从而使哲学变成服务于人类现实需要的一种手段。在古典政治哲学中始终坚持“善先于权利”的原则，即坚持社会道德对个人的优先性；而这一传统被“自然权利”学说的兴起所打破，自霍布斯政治哲学开始，“权利先于善”原则颠倒了自古希腊以来所形成的政治哲学传统，于是“自然权利”便取代了“自然法”，接下来随着“自然”一词在“正当性”方面的贬值，“人的权利”又取代“自然权利”，“人权”就这样取代古典政治哲学中的“正义”成为现代政治哲学的核心价值 and 理念。

在这场由古典到现代的政治哲学转变中出现了三种不容忽视的倾向：

(1) 实证主义所带来的平庸。主要是由于学术专业化而形成一种大批量制造“学者”现象，这些学者大都只能徒然让人“知道越来越多的鸡毛蒜皮”，这些专注于实证的所谓研究不但不能够启发人们思考；相反，会使整个学术陷入一种“普遍的市侩主义和四处蔓延的媚俗主义”。知识的民主化和平等化使得哲学沦落为平庸的知识，一切知识不再有重要与不重要之分，不再有知识的纲目之别和等

级秩序，而有的只是追逐时尚的花样翻新。

(2) 历史主义所导致的道德虚无主义。现代性运动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用“进步”观念取代传统的价值判断，它所造就的是一种“万物皆流，一切俱变”的时代，在这种时代里人人追逐新潮，事事标榜时尚，历史在与时俱进中形成，所有标准在“历史进步”中变得反复无常。这种伴随着“进步”的历史观念无情地冲刷着人心原有的深度、厚度和浓度，导致人类生活的日益平面化、稀释化和空洞化，从而形成道德的虚无主义倾向，人类理性发展得越高，我们的虚无主义情结就会越深，我们就越无法成为自己社会的忠诚成员。

(3) 自由主义所导致的人的堕落。西方现代性的全部问题在于，类似康德这样的哲学家抹杀了哲学家的自由与普通人自由之间的区别，他们想当然地以为哲学家之所欲也就是全人类之所欲。其实，那种自主自足的自由绝不是像康德所预设的那样是所有人的潜能，它既不是所有人都有可能达到的，也不是大多数人所欲求的。彻底的自由把人们赖以生存的根基连根拔起，它从根本上动摇了公民政治社会的根基，进而把人置于虚无之中。自由主义的吊诡在于，最高的善或者至善就是把所有善的标准都放在没有任何公共意义的私人领域中，这样所有的神圣和崇高赖以立足的宗教信仰、爱国主义、亲情友情爱情等都被彻底颠覆，自由主义宣扬人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活得开心而不受管束，却全然忘记了追求品德高贵、出类拔萃和德性完美的人生更加具有意义，于是自由主义的普遍流行必然带来人的品质的彻底堕落。

施特劳斯对以现代性为根本特征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批判，无疑是深刻、犀利且令人震撼的，但他对古典政治哲学的把握是以他对现代性问题的关切为切入进路的，由于需要与现代性的“权利先于善”的原则相对照，所以他把“善先于权利”原则强加给古典时期，并以此作为自己诠释古典政治哲学的逻辑主线，这就造成了他对古典政治哲学把握的先入为主，进而导致对古典尤其是古希腊政治哲学的误读和歪曲。这尤其表现在他对青年苏格拉底与老年苏格拉底相区分，以及对哲学与政治关系的诠释上，把哲学说成是具有“癫狂性”和破坏性的，这种对哲学的界定既不符合柏拉图时代的实际，更不符合现代哲学的现实，而只能是施特劳斯自己心中的哲学，说政治哲学必须返回常识是有道理的，但说这种常识必然遮蔽生活的真相和真理，似乎也失之武断。生活的真理其实就是简单的和符合常识的，故弄玄虚地“玩深沉”乃是一种假的哲学，哲学就是对我们日常生活的深刻追问，哲学必须为人们的生活提供切实的智慧，否则就只能是对哲学的扭曲。政治哲学就是要为人们揭示社会政治生活的真相，而真理和真相会打破政治社会的稳定和文化传统的连续性，完全是一种妄见，事实上具有社会破坏作用的所谓真相和真理，完全是那些蛊惑人心者打着真相或真理的旗号向公众兜售

的谬见和邪说，社会大众没有理由惧怕生活的真理。

施特劳斯政治哲学的主要问题在于：他以“现代性问题”这个现代问题为先行出发点去回溯过去，并重新检查传统，而不是采取走进传统、体会传统的方式来把握传统，所以他为人们呈现的传统是一种太多注入当代人对于“现代性”关切的传统，因而是一种加进过多臆想和误读成分的伪传统。在这种所谓传统中所呈现出来的不是先贤们的生活和生命的智慧，而只是施特劳斯本人对生活的理解以及由此而承载的生命智慧，这种生命智慧不可说不伟大，但这种伟大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伟大灵魂中所蕴藏的生命智慧相比，仍然是相形见绌的。寻找被现代西方政治哲学所丢失和遗忘的传统，必须是真诚地、不带任何偏见地回到苏格拉底，面对苏格拉底所面对的问题，并以苏格拉底的思维方式来寻求“苏格拉底问题”的解决，同时从苏格拉底、柏拉图对“苏格拉底问题”的解决中体会传统，汲取传统中所浸润的那些伟大灵魂的生命智慧，最后再以传统的视角来反观现实，透视由于现代性遮蔽所造成的人们生活本真的迷失，进而才有可能为人类摆脱当下的现代性困境找出思路和办法。

以我们的体会，“正义问题”是苏格拉底、柏拉图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同时也是真正意义上的“苏格拉底问题”，从《高尔吉亚篇》苏格拉底与高尔吉亚及其弟子们的论战，到《国家篇》苏格拉底为捍卫正义与塞拉西马柯、格劳孔和阿德曼图等人的舌战，无不展现出“正义问题”在苏格拉底、柏拉图哲学中的中心地位，亚里士多德甚至认为，正义在社会体系中的地位可与真理在思想体系中的地位相比拟。柏拉图为了解决正义问题才构筑了他著名的理想城邦；而亚里士多德也同样是为了解决正义问题才写出了他不朽的《尼各马科伦理学》；面对同样的正义问题，西塞罗在他的《共和国》中提出了著名的自然法思想；同样面对正义问题，奥古斯丁为人们构筑了他的“上帝之城”。所以，“正义问题”是古典政治哲学的核心问题，由此而形成的西方政治哲学的传统，就只能是一种正义的传统。现代西方政治哲学对其传统的背叛，主要来自马基雅维里主义和霍布斯主义对正义传统的颠覆，自洛克开始兴起的自由主义和“自然权利学说”，只实现了对古典正义传统的局部重建，同时也为强盗们为自己的非正义行为进行辩护留下了巨大的话语空间。现代西方政治哲学用自由、民主、权利等强势话语遮蔽了古典的正义传统，而以强调个人权利至上的功利主义、自由主义、个人主义，夹杂着社会达尔文主义强权思想和国家利益至上的强盗逻辑，使得现代社会充满着冲突、焦虑和空虚，美德的缺失、崇高的贬值、欲望的泛滥，导致人们生命意义的匮乏，物质生活的高度富有与精神生活的极度贫困相映对照，反映出人们生命质量的严重流失。再回到苏格拉底的“什么是人最想要的生活”的追问，以及苏格拉底“合于美德的生活”的回答，我们难道不能够获得许多启示吗？

四、中国政治哲学及其重建

中国有没有政治哲学？这是一个有趣的问题。中国有长达五千年的文明史，其中有确切历史文献记载的政治文明史，从夏代算起有四千多年，从西周算起则有三千多年。绵延达四千余年的政治兴衰成败史，为华夏民族积累了丰厚的历史经验，这些是古代先贤们对政治问题进行哲学反思的前提条件，“自古兴亡多少事”，事事皆浸染着古代中国人对政治兴衰成败的独特理解和诠释，这便是中国古典的政治哲学的基本内容。而古代中国对政治游戏规则合法性的追问起码可以追溯到周初时代，兴亡问题是中国古代先贤追问政治生活所关心的核心问题，他们又常常把政治的兴亡与反映西方人正义精神的“天道”联系起来，从而认为政治统治符合天道则兴，违背天道则亡，于是形成一种与西方正义传统相呼应的“天道传统”，而形成于先秦的诸子各家，则是由于他们对“天道”的不同的理解和诠释而形成分野，从而形成风格各异的政治思想和政治哲学，其中最具代表意义的是儒家与道家。

以孔孟为代表的儒家，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的最主要学派，他们自觉继承西周以来所形成的“德配天命”的政治哲学传统，把天道人心看做权力合法性的最终判据。孔子更以民间教育的方式，打破官僚贵族对知识、话语和权力资源的垄断，兴起了一场以“学而优则仕”为核心内容的观念革命及制度革命，形成了以“科举制”为基本内容、以美德为基本评价标准的制度体系，这一制度保证了公共权力资源对所有社会成员的平等开放，同时又保证了公共权力资源基本上控制在具有人文关怀和道德情操的文职官员手中，这样既淡化了政治权力的暴力压迫特征，又使作为维持社会正义（天道）基本工具的国家机器能够有效地产生作用。在学术思想上，儒家学者把“天道”转换成“王道”，从而形成了以“王道政治”为主要内容的儒家政治哲学。儒家王道哲学在权力合法性上坚持天道、道统和民意三重合法性的同一性；在施政方式上主张以亲民、爱民、富民为核心内容的仁政；在统治关系上主张一种“纲常伦理”，认为处于社会统治地位的君与君子（包括夫、父），应该在道德上为民垂范，成为处于弱势地位的民（包括妻、子）的道德典范，这是正义秩序思想在统治关系问题上的集中体现。孔子更把维护正义秩序的思想转化为他关于处理人际关系的教诲，即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忠恕之道”，因为只有社会事件中的强者相对于弱者才具有以“施”加于人的能力，所以孔子“忠恕之道”的实质就是“正义之道”。儒家政治哲学所倡导的“王道”是中国传统政治之所以能够长期维持“广土众民”的巨大社会共同体的稳定和繁荣的根本精神支柱，或者说“王道政治”思想是用中国传统儒家话语来进行诠释的社会正义精神。

除以儒家“王道政治”的政治哲学为主干外，以老子为代表的政治哲学则把“天道”提升到“形而上”的超验境界，并准确地将“天道”表述为“损有余而补不足”，即社会正义精神所强调的“抑强扶弱”。从“天道”精神的“抑强扶弱”逻辑中，老子推出了他政治行为准则的“守柔”原则，即所谓的“无为而

治”，其警世名言为“治大国若烹小鲜”，强调为政必须谨慎，须力戒骄横妄为，他告诫当政者“道常无为而无不为，侯王若能守，万物将自化”。其实老子提倡为政的“谨慎”与“无为”，并不是要人们在政治上无所作为，而是告诫人们“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因此要“无为而无不为”。老子政治哲学在汉初经改造成《黄帝四经》后，成为官方意识形态，统治西汉约70年，到武帝时期方逐步改变。其后老子政治哲学一直是官方统治思想的有机部分，并扮演着对主流“有为”政治哲学进行有益消解的补充角色。

发生于1848年的鸦片战争，从根本上打破了中国延续几千年的自给自足政治体系的基本状况，中华民族开始了她艰难地融入世界的历史。国际社会所奉行的“丛林法则”和强权政治，使得中华民族奉行几千年的“正义秩序”变得十分不合时宜，在“强权就是公理”的强盗逻辑面前，中国人长期所习惯的克制、忍让和宽容，都变成了令人鄙夷的“劣根性”，那些长期用来教化国人必须养成公正美德的文化，也在西方列强的杀戮、掠夺和蔑视中变成了必欲彻底根除而后快的“历史包袱”。在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声讨和彻底清算过程中所兴起的是一种“革命文化”，它是在种族存亡命悬一线的历史条件下，汲取西方文化中的反抗因素和中国传统士大夫的“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精神，而混合成就的一种能够体现生命崇高意义和爱国主义情怀，同时以反抗秩序和毁灭传统为特征的正义的文化。由于位于东亚的中国长期以来没有真正承受过外来的侵略、压迫和掠夺，所以中国传统文化中缺乏那种反抗文化的基因；而上百年来的民族苦难史教会了中国人去体会强权的压迫、剥削和欺凌，并形成了以“毛泽东思想”为主要代表的“革命文化”，从而为中华民族思想遗产中注入了具有反抗特征的正义文化的新元素，进而丰富了我们的思想文化遗产。

但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我们继续沿用“革命文化”遗产，却对这一文化遗产在建设过程中的破坏作用没有清醒的估计，甚至自觉不自觉地利用国家政权的强力来推动“继续革命”，从而不仅加剧了“革命”对自己历史文化传统的破坏作用，而且也在这种破坏中扭曲了百年反抗中所形成的新的“革命传统”。于是“革命”在没有压迫而反抗的条件下，变成了无目的的疯狂施暴的非正义，变成了对历史文化遗产的变态摧残，变成了人性畸形的凶残……“革命”同时也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百业凋零，濒临崩溃。1978年以后，中国进入了对“革命文化”的矫正时期，废止阶级成分、给右派摘帽、平反冤假错案等，翻开了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以改革、开放、发展为时代主旋律的新的历史时期，一扫“革命文化”时期的颓败，使国家和民族都重新焕发了生机，虽然“革命”世界观还时常制造出一些不和谐，但在“革命”的“病树前头”毕竟已经出现竞春之“万木”，把“公平正义”重新规定为国家政治建设的目标，放弃“斗争哲学”倡导建设“和谐社会”，力图实现由“革命党”到“执政党”的转变等，都意味着“革命文化”已经逐渐离我们远去。

我们接下来的任务就是要在“革命”之后的废墟上，重新建构中华民族的新文化，这种新文化当然会把“革命文化”的遗产包容其中，同时需要包含传统儒

家和道家政治哲学的遗产，同时也必须吸收西方政治哲学的全部遗产，其中最主要的是以古希腊政治哲学为代表的古典遗产。现代西方以自由、民主、人权为主流话语的政治文明，已经成为西方发达国家实施文化侵略和文化殖民的工具。中华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不成为西方强势文明任意宰割的对象，就不能不在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流下，创造出异于西方的政治文明来，即把中华传统的政治文明资源转化成现代中国的政治制度和政治生活方式，再用我们的政治文明成果来影响世界，主要是通过文化重建尤其是政治哲学重建的方式，让我们的文明资源为全人类共享，这是当代中国文化建设的最根本任务之一。

小结

本部分首先给出了关于政治概念的定义：政治是以公共权力为核心内容的游戏；进而研究了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根本区别，还指出了西方政治哲学存在着一个以正义为核心内容的传统，施特劳斯对以现代性为根本特征的西方现代政治哲学的批判，无疑是深刻、犀利且令人震撼的，但同时他坚持用“权利”与“善”的关系来解读西方政治文明传统的做法也是先入为主的，并导致他对西方政治哲学传统的误读和歪曲。中华民族有绵延达四千余年的政治兴衰成败史，这些是古代先贤们对政治问题进行哲学反思的前提条件，并形成一种与西方正义传统相呼应的“天道传统”，儒家与道家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传统的最主要代表。复兴中国传统文化，必须从继承和转化中国古代政治哲学传统入手。

复习思考

1. 如何理解政治是以公共权力为核心内容的游戏？
2. 如何理解政治学与政治哲学的区别？
3. 你认为施特劳斯用“善优先于权利”来解释古典政治哲学可以接受吗？
4. 你认为中国古代有政治哲学传统吗？

参考书目

1. 维特根斯坦：《哲学研究》，汤潮、范光棣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年。
2. 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
3. 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

第一章

正义传统的形成 ——欧洲古代政治哲学

第一节 古希腊城邦——民主政治的摇篮

现代西方文明的源头有三：一是古希腊的城邦民主制及其哲学；二是古罗马的法制传统；三是古犹太-希伯来文化的神教传统。其中，古希腊的民主制和哲学是西方文明的主流，而这种主流文明就是建立在古希腊城邦制的基础之上的，正如我国著名的思想家顾准先生所指出的那样：“城邦制度既是希腊的传统，也是希腊政治思想的不可违背的潮流，是希腊政治学的既存前提，离开了城邦制度就没有政治学。”

古希腊的城邦制是当时爱琴海地区一系列历史条件文明演进的结果，大约在公元前5世纪前后，具有相同宗教习俗和语言的爱琴海地区的古希腊人纷纷兴建各自的城邦，这些城邦基本上围绕一个卫城而建，卫城（polis）通常是城邦的心脏，环绕卫城的是建有文化广场、祭祀场所以及其他公共设施和居屋的城市，城市连同它周围的乡村地区便构成一城邦。当时的城邦普遍面积不大，最大的是斯巴达和雅典，面积也只有1000平方哩^①，大约相当于中国的一个县的面积，其他城邦面积在70~350平方哩的范围内。城邦是古希腊时代所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政治共同体，这种共同体具有如下几个方面的特征。

（1）政治自治特征。在古希腊，一个城邦就是一个拥有独立主权（自己管理自己政治事务的权力）的政治共同体，它们拥有自己的法律，根据法律拥有自己的议事会、执政官和法庭。有时为了共同抵御外敌的需要，它们也会结成城邦联盟，并推举某个城邦为盟主，但盟主只负责协调城邦间的共同事务，对城邦内部的事务则不予干预。有人认为，之所以形成这种城邦间各自为政的局面，是由于

^① 1哩=1.609公里。

这一地区多山，交通极为不便，从而形成不了广土众民的政治共同体的缘故。

(2) 自我保卫特征。希腊诸城邦当时的军队是一种公民军制度，这种制度是形成城邦“主权在民”政治观念的最主要原因。所谓公民军，是指每个享有公民政治权利的人，都同时承担着保卫城邦的义务，遇到战争每个公民必须携带自己的甲冑、武器、马匹和生活物资去参加战斗。开始城邦的政治事务大都与战争有关，所以每个需要参加战争的人，就理所当然地拥有参加讨论政治事务的权利。后来，就把这些有权参加城邦政治事务讨论的人，称为公民。当时的城邦公民不仅意味着拥有参与公共事务决策的权利，同时意味着承担保卫城邦的义务。

(3) 直接民主特征。对于城邦来说，凡是承担保卫城邦义务的公民，都同时成为这个城邦的主人，这样公民与公民之间自然平等地享有管理这个城邦的权利。这就是最原始的“主权在民”观念的来源，即管理城邦的权力属于该城邦的全体公民。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这时的公民绝不是指居住在城邦里的全体居民，因为妇女、奴隶、农奴、边区居民和外邦人都不属于公民之列。在雅典拥有公民身份的人最多估计也不会超过6万人，一般时候，公民人数只占城邦居民总数的10%左右。由于公民的人数不多，于是才可以通过直接选举的方式，甚至抽签的方式在全体公民中平等地分配政治权力，即实行以公民在政治权利上人人平等的直接民主的方式来管理城邦。

(4) 依法治理特征。城邦实行的是以公民集团的轮番执政为原则的管理形式，要使这种管理能够公平而有序，必须制定出符合这种管理原则的规章，即游戏规则。这些规范权力运作的游戏规则就是法律，依据这些规则或制度来管理政治生活，便使得这种政治游戏具有一种“法治”的特征。以法治为特征的政治游戏，它首先规定每个公民在游戏规则面前的平等性，没有人能够超越法律的规范；而以“人治”为特征的政治游戏，游戏规则可以因人而异地修改，所以游戏规则不具有什么超然地位和神圣性。

希腊城邦民主制的萌芽在公元前8世纪的迈锡尼时代就已经开始孕育，因为那时就已经开始有公民军制度，这种制度规定军中的重大事情要召开全军大会来宣布，不过这时讨论和表决的方式还没有形成。后来，有“万民之王”之称的阿伽门农，为了解决继续围城还是解围撤兵的问题，就召集了一个由各军首领们参加的会议，来进行讨论并作出决策，这可能是最早见于记载的议事会形式。但真正作为政治制度的民主形式的形成，还要等到古希腊雅典的城邦时代。雅典城邦民主制的形成，大致经过了以下阶段。

一、梭伦改制

梭伦是雅典贵族，他以公正和智慧而闻名，因为他曾鼓动和领导了雅典对麦